

載特

# 香港人的現實心態

——按北平的規則辦事

李怡 著  
彭慧鸞 譯

就在過去的這一年，香港人對這片英國殖民地將於一九九七年移交中共之後的命運，在看法上有了顯著的改變；而這種態度上的改變，在商界領袖和專業人員之間最為明顯。稍早，他們所極力爭取於一九九七年以後的「港人治港」，已經逐漸因希望渺茫而被放棄；退而求其次，只希望能保障現行制度維持到一九九七年而不變。造成態度大幅轉變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北平「官員」對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所做的詮釋，以及在「基本法」草簽階段，中共主張一九九七年之後以這本「小憲法」統治香港的立場。

在香港，商界領袖與專業人員組成了一個特別團結的社會階層。他們的相互依存與合作，是香港繁榮與壯大的基礎。同時，他們也受惠於香港的自由環境；而英國的司法和稅賦制度，更是偏重於他們的利益。

## 重重疑慮

無庸置疑，若非一九九七的大限臨頭，他們仍將採取一貫態度，反對代議民主政制的發展。畢竟，選舉是一件耗費頗多的差事。更重要的一點，是代議制本身極可能帶來社會基層對政府實際運作的參與。結果必然導致對一向被忽視的社會福利政策，作進一步改善的要求，而稅賦也會相對提高。這種情勢的發展會直接侵犯到富裕者的特權。

但是，一九九七的陰影造成資本家的改變。當前他們主要關切的問題，是如何將目前所享有的自由，維繫到一九九七年以後。雖然現在香港的安全仍在英國法律的保障之下，但是中共接管之後，是否有能力或意願維持香港現狀？頗值懷疑。

最近，中共喊出了一個簡單而動人的口號——「港人治港；制度維持不變」。當然，它所牽涉到的一個先決問題，就是究竟香港人要如何治理香港？

許多香港人對於自治這個概念的可行性，抱持相當的疑慮。在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以前，讓我們先看看一九八四年九月公佈的「聯合聲明」附件之一中，中共對香港提供了那些保證？

就北平與香港的關係而言，「聲明」中規定，「除了外交和國防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的權責之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被賦予行政、立法及獨立司法權。」

至於一九九七年之後的政治制度方面，香港可實行民主代議制。「聲明」中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須對立法機關負責」。既然中共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承諾，原則上，就該由這個民選政府負責確保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的自由。

「聯合聲明」中亦提及高級官員的遴選問題。它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應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再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些規定看似有利於政黨的發展。也正因為如此，行政長官與大多數主要長官自然會受政治立場相近的利益團體所控制。

依據附件一中的上述三項條款，香港商界與專業人員得以明正言順地致力於推動「港人治港」。他們之中，有些人真誠地相信，只要有英國在一九九七年之前的統治，再配合某種形式的民主政制的發展，「聯合聲明」所描繪的政治藍圖，必然能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獲得實現。因此，去（一九八五）年上半年，他們努力地計劃與討論內閣制的可行性、政黨政治與直接選舉的前景等事項。

然而，北平對這些條款有另一套極不相同的看法。自去年七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開始，中共就利用各種機會，表明他們對一九九七年以前政制改革的看法：

——北平表示將不會考慮爲了遷就香港「基本法」而修改「憲法」，也不準備將憲法中不適用於香港的條款，載列於「基本法」之中。

——中共所謂的「選舉」既非直接亦非間接選舉，而只是「提名候選人的選舉」。至於行政機關該如何向立法機關負責，中共已明白表示反對制衡制度；而所謂負責的意義，只是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闡明、解釋，以及商議其決策的行爲。

——北平不支持香港成立地方政黨，不管是一九九七年前或以後皆然。事實上，中共不鼓勵香港人從事任何形式的「集體討價」。

——中共反對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前獲得大幅度的政治發展；也不希望見到代議政制或直接選舉。

——在中共眼中，英國政府有責任確保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前後的「繁榮與安定」，但這並不意味中共鼓勵或支持政制改革。顯然，在一九九七年前，對於任何政制改革的嘗試，中共都希望扮演積極有力的諮詢角色。

當北平企圖就香港問題發表意見時，它常採取戲劇化手法。例如去年北平派駐香港的「最高代表」許家屯聲稱，中共堅決主張「按本子（聯合聲明）辦事」，其目的便在表明中共反對香港實行代議政制和政黨政治的立場。爲此，中共曾在非相關的會談中，迫使英國一起討論一九九七年前後的香港內部行政。中共總不會忘記表明它權力經紀人的地位，因此，絕不會枯坐一旁，保持緘默。

## 現實主義者

香港的商界領袖與專業人員，一向精於觀察政治與經濟的風向。就在中共暗示它對香港政制改革立場的同時，他們也意識到，該是重新解釋「聯合聲明」附件之一的時刻了，那就是接納北平的說辭。他們知道若再堅持在香港進行政制改革，將會徒勞無功甚至造成反效果。

香港立法局議員利國偉，一度熱心支持在香港成立政黨，但是最近已經放棄建黨的希望。他不得不相信，將來在中共統治之下，絕不會容許「港人治港」。

很少香港知名人士會承認自己對香港已經喪失信心。不管他們所抱持的是那一種樂觀主義，基本上還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以及北平所提出的保證多所關聯，而與「聯合聲明」中附件之一的關係較小。畢竟，資本家多為現實主義者。他們如果反對中共「政治局」的意見，無疑是以人頭去碰「長城」，何苦而來哉？與其不斷的梦想一九九七年以後的空中樓閣，不如乘大英國旗尚在飄揚之際，專注於事業，以賺錢為要務。

因此，現在有許多香港商人反對直接選舉，也普遍不再熱衷於代議政制；他們開始儘可能與北平合作。此種作法並非以維持香港安定為出發點的利他思想；而是反映了香港人想發財的心態，至於專業人口方面，只要從向外移民人口的增長數字，就能了解一切。

對於香港商界領袖和專業人員而言，他們所擔心的已經不是一九九七年的到來。而一九九〇年前後才是他們所關心的時限，因為，屆時必須開始向外轉移資金，或設法離開香港。換言之，一九九七年的最後防線已經提早到了一九九〇年。

（本文係本中心助理研究員彭慧驚小姐譯自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十二日《亞洲華爾街日報》；原文作者為香港八十年代月刊主編。）